美国出版《康雍乾内务府考》等书简介

吴伯娅

《康雍乾内务府考》,作者普雷斯顿·托伯特 (Preston Torbert),1977年出版。全书共六章：一、《内务府的背景》。介绍了中国的太监、满族社会及其政体和内务府的起源，尤其是内务府建立的直接背景。二、《内务府的概况》。叙述了内务府的机构及其主要作用。三、《内务府奴隶的社会组织》。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和清代的奴役性质、旗的创立与包衣和皇帝的关系、包衣的社会结构、审查制度、社会流动的独特方式及其在内务府的服役情况。四、《内务府的财政功能》。内务府复杂的财政功能是皇帝个人财富的来源。在这一章，作者考察了作为内帑固定来源的内务府的各种生财之道。如内务府的地产、人参贸易、商业经营、盐铜专利、关税、皇家工厂、进贡制、籍没等，介绍了内务府的库房、秘记处以及内务府的支出。五、《两个作为例证的案件》。剖析了高云从案和高朴案。六、《结论》。美籍学者吴秀良（Silas Wu）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这本书第一次对清代内务府的结构及其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制度上的研究……随着研究结果的大量出现，托伯特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清代的契约奴隶制是否促进了帝国政府和社会上独裁主义的发展？十八世纪的和平和繁荣是否提高了皇帝的经济影响，巩固了专制制度？这些问题，对于加深我们对清代社会政治史的了解很有意义。”

《中国的边远岛屿——台湾的历史地理研究》，1980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罗纳德·可纳普（Ronalb knapp)编辑，这是一本台湾史研究论文集。全书辑录了11篇关于大陆人迁徙台湾定居、发展台湾经济的论文。其中5篇是根据1977年美国地理学家会议上的论文扩充和改写的，其他论文则出自对台湾进行过实地考察研究的地理学家之手。罗纳德·可纳普将这些论文分为两大部分：《迁徙和农居生活》、《都市化和经济一体化》。在第一部分，历史学家徐文雄概括了台湾从一个土著居民的岛屿到归入清帝国后的变化，并考察了清代台湾的民间团体和骚动。王益寿的文章谈的是台湾土著居民与大陆人迁徙的意义。并分析了1739至1875年，清政府关于禁止移民定居山地的法令，以及取消禁令后的变化。罗纳德·可纳普和徐初云考察了台北两个地区不同的开拓形式。可纳普研究了桃园平原的开拓史，发现大陆上的一田两主制是十八世纪鼓励贫苦农民移居桃园平原的决定性因素。徐初云的研究则表明，宜兰平原的开拓主要是十九世纪台湾创业者的成就。另外，谢超明对台湾地名如何表现当地早期的历史作了解释。在第二部分，人类学者多纳德·迪克洛珀论述了鹿港城的兴衰及其贸易制度。他指出，作为清代一两个“法定的”港，鹿港在1790年至1895年是繁荣昌盛的。后来，日本人控制了和福建的有限贸易，铁路又为台湾提供了可靠的廉价的运输，鹿港城因此急剧衰落。克利夫顿·佩内尔等人利用空间分析描述了1600年至1972年台湾运输体系的特征。最后，杰克·威廉斯对台湾的糖业进行了研究。

《清朝十八世纪财政改革》,(1984年出版，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女士。美国学者孔飞力教授称赞这本书是“一个非凡的成绩，是根据大量中国的档案所作的最好的制度上的研究。它将成为一代研究人员的典范。”这本书共讲了如下几个问题：一、从明末财政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清政府对于制度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官僚主

义的解决方法，分析了清初财政不稳定的根源。二、探讨了清初税收的分配情况，地方政府的财政需要和非正式的资金提供制度。三、研究了清初财政亏空的情况、地方财政管理的改革——火耗归公。四、考察了各地火耗归公的情况。五，从公共消费资金、公费的分派、养廉银、改革后的陋规四个方面，叙述了地方上的变动和基本原则。六，就下级的腐化和在江南清查赋税的情况，研究了改革的障碍。介绍了清政府为控制拖欠赋税所定的措施，叙述了清查江南赋税的起因、过程以及官员们对此事的态度，分析了赋税混乱的情况，并作了估计。七，描述了乾隆初期关于火耗归公的争论，对乾隆朝火耗归公的作用和嘉庆朝火耗归公的情况作了评价。

介绍日本史籍《清水笔语》

冯佐哲

《清水笔语》顾名思义，乃是在日本清水地方（今静冈县清水市）进行笔谈的记录。

1862年（道光六年，日本江户时代文政九年）1月1日，漂流到骏河国大井河口（静罔县榛原郡吉田町住吉）的中国“得泰号”商船，引起了该地官员与民众的不安。因为当时日本正处在锁国时期①，一般外国船是很难在日本港口靠岸的，就是被幕府允许通商的中国和荷兰商船也只能在长崎一港靠岸。于是“得泰船”经过日本地方官吏的严格检查，证明它确实是一艘从事商业活动的，从宁波开往长崎的商船，而且该船载有因海难而漂流到南洋群岛帕拉欧岛的三个日本渔民。后来“得泰船”驶至长崎后，又被特许在骏河清水港修理船只。这样在1826年1月19日，该船又返回到清水。在此地逗留了约五十天，在该年3月离开清水，驶往长崎。

清代前期，特别是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商船不断到日本长崎等地进行贸易。当时也不时有日本的“朱印船”到中国进行贸易。到了道光年间，虽然驶往日本的中国船数目有所减少，但两国商船还在互相往来。例如，就在“得泰船”驶往日本的同年（道光六年，1826年）4月20日，就有一艘日本九州萨摩地方的“财力丸”船漂流到中国长江三角洲浏河口附近②，后来该船船员在浙江乍浦滞留了数年，于道光十年（1830年），才乘坐中国从乍浦去日本的“寿昌船”回国的。

“得泰船”在清水滞留期间，以江户幕府的骏府代官（即知事）羽仓简堂为首的三人③与以“得泰船”船主杨启堂（号嗣元，浙江宁波的贸易商人）为首的四人④进行了笔谈。笔谈的记录就是这个《清水笔语》。

在《清水笔语》中，除了中日双方人员互相询问了船只大小、航程、双方人员的名号、职业外，还交谈了越南、泰国等中印半岛诸国的情况，以及富士山与天台山哪座山更壮美、清朝嘉庆、道光皇帝的简况、中国江南地区的风光、中国的食物、水烟袋以及烟草等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谈及了两国学术交流问题，诸如清代著名学者朱竹坨（彝尊）、赵翼的著述，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的出版情况，并且当场双方进行了作诗唱和等活动。这些材料在今天已是不多见的了，因为当时中日两国均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相对来说，双方人员交流的较少，除了通商外，学术交流留下的资料就更少了，因此，《清水笔语》就显得更